

為國肅奸卸法衣

## 當年我逮楊玉清

程德受

我卸下法官的法衣已經二十年了！  
回憶當年卸下法衣的經過，是一回非常莊嚴又興奮的事。

## 蔣鼎文先生口角春風

我原係中央警官學校畢業，應該說警察才是我的本行。我僥倖在母校考取出國留學，因為美國加州大學當時僅有的一門警察行政功課，列在政治系的課程裏，我在加大選習警政課程，就在政治系攻讀，在那里獲得了政治學學士及碩士的學位，仍與司法無關。

三十七年四月，我從舊金山乘船歸國，同船的蔣銘三（鼎文）將軍與我沿途暢談，對我頗有好感。他是浙江諸暨籍，諸暨人尊之如家長。當時的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將軍，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博士都是諸暨人，對他非常恭敬。船到上海時，兩個機構的高級官員和軍樂隊，聯合在碼頭歡迎。銘三先生下船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這個人交待給宣俞兩氏，要他們將我予以延用。俞

叔平博士原是我的老師，對我本有相當認識，加上銘三先生的提携，決定留我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。我因為出國求學是中央警校派遣的，認為自己已有回到母校教幾年書的義務，就把俞老師的好意謝絕了。

回校任教不及一個學期，因共匪叛亂，大陸局勢有急劇的變動。政府為挽救這種局面，邀孫哲生（科）博士出而組閣，以尋求光榮和平為任務。吾師趙頌逸（琛）先生為刑法學泰斗，原任首都高等法院院長，在孫內閣以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代理部務。趙氏於三十八年元月三日接事，找我擔任秘書工作。因為司法部與警官校同在南京，到司法部工作不妨礙我的教書，我在獲得學校的同意以後，就隨同趙氏到司法部接事。

我與趙氏的相識是很偶然的。三十三年春，吾師李夢周（士珍）先生預見抗戰即將勝利，為準備淪陷地區的復員工作，在警校設立了警政高等研究班，調集各省警務處長，保安處長，省會警察局長等高級治安首長作三個月的研究。後來

的臺灣省警務處長胡遠先生，首都警察廳長韓方伯先生，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博士等，都是這個班結業的。那時我已在校任教，奉派以速記員名義到班聽講。這班的講授人員，都是一時之選，刑事訴訟法的講席就是立法委員趙琛頌逸先生（趙先生在抗戰前及抗戰時期均任立法委員，勝利後改任首都高等法院院長）。

中央警官校在重慶南岸彈子石，交通頗為不便。對遠道的講座設有招待室，供應膳宿。趙氏家住北碚，有相當的路程。刑事訴訟法的功課一連二天，不便當天下課回家，第二天再來，就在招待室裏下榻一天。趙先生一人閒居，正需要人陪伴。我在晚上，帶了兩本與刑法有關的講義，刑法概論與法醫學，向趙先生請教。大概趙先生在我辭出後當晚就把那兩本書翻閱了一遍，第二天早上見面時對我慰勉有加。法醫學一書並介紹給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。

趙先生受命代部司法行政部部務以後，因為有重慶彈子石這一段的淵源與認識，找到部工

作。我的前任是司法院故秘書長王彩生先生，那時他已年近花甲，滿嘴鬍鬚，見我一個二十幾歲的人去接他的工作，再三表示懷疑，問我接他工作的是不是我本人。趙師的前任是今司法院院長謝冠生先生。冠老長部時，對部內工作人員中之有司法官資格者，多在法院寄一司法官的實缺，以調部辦事的名義，在部服務，以培養司法官的年資。趙先生肅規畫隨，要我將刑法概論的著作送審，由司法官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後，亦派以司法官的實缺。在我說來，當時的穿上法衣，只是客串而已。

### 趙琛老師從善如流

政府遷廣州後兩個月，孫內閣總辭，趙先生離司法部。我被調任為上海高等法院檢察官。這時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楊兆龍自南京飛廣州。他告訴我，他此行任務在為趙先生離部表示惜別之意，並擬為我的出處作一安排。

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一職，自北伐成功以迄共匪全面叛亂，南京局勢危殆，二十年間，都是黃花崗之役生還革命先進鄭烈先生充任。華北陷匪以後，鄭氏因為曾經下令通緝匪酋毛澤東，認為以早日離京為宜，於三十七年多離職來臺，檢察長職務，交檢察官王起霖先生暫行兼代，它的缺是虛懸的。趙先生代主部務，安頓部內人事完竣，調整部外人事時，第一張條諭是：「首都高等法院推事兼院長趙琛另有任用，應予免職。」首都高院及高檢處人事安排好以後，接着一張條諭：「派趙琛兼代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。」

「這些條諭都是當我的面寫的，準備交給我轉送人事處辦稿發表。趙先生寫好派他自己兼任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的條諭時，我表示意見了。我說：一個代理首長派自己兼任一個附屬機關的首長，總不是一件妥當的事。趙氏聽了我的反對意見後，向我說明，無論他現在任政務次長代理部務，或者將來真除部長職務，都是政務官，隨時可以免職的。而最高法院檢察長却是終身職，可以不受政局的影響。所以他寧可擔任檢察長而不願擔任部長或政務次長。我堅持我的反對意見說：既然檢察長是這麼好的一個職位，那麼自己更不應派自己兼任了。我並且建議趙先生，若自己確有意要兼任這個職務，作為將來的退路之計，亦最好由行政院孫院長派兼比較適當。趙先生聽了我的話以後，就把他派他自己兼檢察長的條諭撕毀了（趙先生到臺灣後於四十一年元月出任最高法院檢察署第四任檢察長，迄今已十七年半。緣楊兆龍未能撤退來臺，張懷老任內改派朱煥彰先生接任，朱氏未及送審。林佛性（彬）部長任內，改派趙先生接任）。

就在趙先生到職後的第二個星期，刑事司長楊兆龍向我打聽檢察長一職的行情，表示他有意進行這個職位。楊司長是留美的前輩，穿着一件藍布長衫，是一位標準的廉潔公務員，濃密而粗黑的眉毛，面貌上已說明他是一位非常富於正義感的執法官官。冠老部長任內美國刑法學權威博士來華，擔任司法行政部顧問，從事改革司法行政的工作，就是出之於楊司長的建議與聯繫。我雖然到部不久，已和楊司長晤談多次，頗

為相得。因為他在司法界的貢獻和地位，我對他亦有幾分敬意。所以他向我打聽檢察長一職的行情時，我就告訴他，不是沒有人想做這一個工作，只是我已反對了。現在還是虛懸。我還說，以他刑事司長的職務，調檢察長的工作是最適當的，鼓勵他向趙代部長談談看。果然，過了一二天，以楊司長接替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職務的條諭下來了。原來暫代檢察長職務的檢察官王起霖則調部，接替楊兆龍所遺的刑事司長職務。

楊檢察長因為有這一段經過，他為酬謝我對他調任檢察長一職的從旁促成，他覺得在趙先生離職前夕，在道義上要給我幫一點忙。因為那時最高法院檢察官尚有缺額，他的意思就是要調我充任最高法院檢察官。在那時的情況來說，只要他能向司法部推薦，趙先生是沒有批駁的理由的。但是我不願在不到而立之年的年齡就到最高法院去做法官。因為那時最高法院法官差不多都是六七十歲的老先生。楊檢察長只有五十出頭，已是年青了，像王起霖檢察官已是七十多歲的高齡。我的答復是這樣的，我當最高法院法官的法律條件是具備了（我以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取得法官資格）。但是實際的經驗，資望，學識等條件尚不具備。現在已發表為上海高等法院檢察官，等到上海高院歷練幾年以後，再請他提携。在他的想像之中，以我這樣回國未及一年的留學生，磨練不夠，到一個新的環境裏，擔任比較重要的工作，往往是容易得罪人的。尤其是到職僅三個月，長官調職，並無下文，很怕我沒有去處而擔心。現在有新任的上海高院首席

劉少榮帶我去，有人庇護，今後在司法界容易生根，他亦樂得不再爲我事關心了。

## 和劉少奇的胞弟同事

趙先生奉命調職，我去上海，是我自己決定的。其原因：(一)司法部遷廣州期間，趙代部長，劉少榮司長和我都是從南京乘飛機到廣州的，王建今主任秘書回家安頓家小，乘火車到廣州時，已是趙先生快調職的時候了。所以在廣州的二個月期間，秘書室係我負責。很多的事情都是我與劉少榮二人合作辦好的。因此我和劉的感情較爲密切。(二)趙先生調職後，主任秘書，總務司長和我三人習慣上必須調開，以便新任部長用人。主任秘書王建今調福建高院首席檢察官，總務司長劉少榮調上海高院首席檢察官，我在司法界年資太淺，調首長尚不孚人望。只有在王劉二人中擇一而附驥尾。因王建今係調福建，而福建高院首長當時尚在職，在此兵慌馬亂之時，對起身砲的接任人員能否順利交接，尚有疑問。而上海高院的首席係地方法院首席兼任，職位虛懸，順利交接應無問題。(三)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先生是老師，警察局的中高級幹部都是同學，上海又是繁華的都市，爲我所嚮往，比起福州的無甚熟人，更是略勝一籌。當然，當時大陸半壁河山尚在我軍手中，和談尚在進行，臺灣地區尚非唯一可去之地。有了這些原因，我就決定調上海高檢處服務了。

去上海的人事命令是三月底發表的。因爲新任部長人在南京遲遲來穗，不能速即移交，竟使

這個命令不能生效。我和劉少榮決定同去上海高檢處以後，我們曾有多次懇談。他知道我對審檢業務尚嫌陌生，要我兼任主任書記官職務，我答應了。他從我在司法部處理搬遷工作上，知道我尚有一點管理的能力，又要我兼任廠產管理室主任。其他如小至生活問題亦處處都能爲我設想，甚得我的好感。可是後來忽然自己對自己發生疑問：劉少榮和我只三個月同事，爲甚麼對我這樣好呢？在和友好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大多數的答案都是從好的方面來解釋的。

我到司法部工作時，結婚尚僅兼旬，由京赴穗，係內子同行。到穗以後，少不了與劉少榮共餐的機會。因爲內子與劉少榮都是湖南籍，談話時免不了問我岳父是誰。問明了以後，劉說我岳父與他尚是朋友，說他擔任長沙地方法院院長職務時，正是我岳父任湖南省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，過從甚多，甚且他還知道我岳母的姓氏。因此，我在決定調上海服務的時候，把我調動的情形，長官的姓名，一併告訴了住家長沙的岳父。我岳父徐慶譽先生，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。在中學生時代，任長沙學生會會長，毛匪澤東爲副會長。這時，毛匪僭論建立「湖南國」，我岳父則爲文維護中華民國的統一。及長，毛匪以好鬭爭殺人，聞名於世，我岳父以創立同富博愛學說爲友好所樂道。總統在江西剿匪時期，曾任總統之秘書及江西省民政廳長，衷誠擁戴總統，堅決反對共匪，立場至爲堅定。接了我的信後，很快的給我回信，告訴我劉少榮是一個共產黨徒叫劉少奇的胞弟。並說這個劉少奇在共產

黨裏頗有相當地位。要我加以注意。我知道了這個情況以後，我對我自己的應否去上海就發生疑問了。我假借若和談破裂，共軍渡江，到了上海如何逃難的問題向劉少榮提出。他的答案是不必怕任何情況，可以保證我不會發生任何問題。聽了這話以後，我已擔憂到有一天他會把我出賣給共產黨徒，我就決定不去上海高檢處了。

南京的最高法院檢察署是資望不足，不應去；福建的高等法院檢察處是怕現任首肯不肯移交，（後來果然不出所料，王建今先生接不到首席檢察官職務而仍回廣州。）不必去；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則因首長靠不住，不能去。然則，我是趙代部長帶去的秘書人員，我在趙氏交卸以後，總不能不讓出缺來，讓新部長可以用人。在我無所適從的時候，我就去問趙先生。問他交卸部務以後的行止如何。他說，國共和談結果如何尚未分曉，和談若能成功，將同上海教書或執業律師。和談若告破裂，將去臺灣。現在只有留在廣州，看看局勢變化如何。我隨即告訴他不去上海高檢處的決定。並要求改派廣東高等法院檢察處，亦在廣州看看局勢變化再定行址。趙氏因爲隨他來穗的屬員都將分別遠離，我若能留在廣州，有一個可以談話的人，欣然的就同意了。我拿到了司法部的新派令，當日就去廣東高檢處報到，以示決心。因此，趙氏交卸司法部是四月十日，而我却在四月九日就到廣東高檢處報到了，移交的職員名冊是早已印好的，我和總務司長劉少榮仍都是印明已調上海高院，尚未赴任等字樣。

（未完待續）